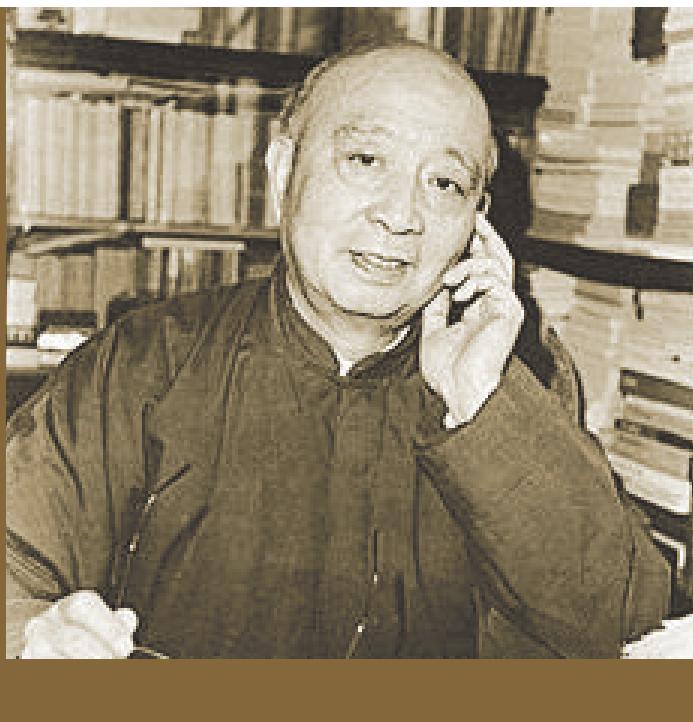


经典作家之唐弢篇



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当时唐弢还是一位20岁的上海邮局的实习拣信生。从追随鲁迅于散文和杂文领域开始创作，到开创性地大量写作书话，再到领衔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半个多世纪的孜孜求索，唐弢的文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也使更多的人了解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辉煌价值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必要与发展潜力。

《唐弢杂文集》：鲁迅杂文的追随与发展

唐弢最先是以杂文名世的。虽然出身贫寒，但少年起即志于读书的唐弢，强烈的求知欲与早尝人生冷暖的阅历体验，使其能够超乎寻常地把握时代精神与生存五味。在家乡宁波公立小学读书时，唐弢就显示出强烈的爱国情感。1925年夏天，当五卅事件引起的罢课风潮波及乡学时，唐弢和老师同学们乘着乌篷船以组织宣传队和化装表演到处巡回演出，以演出收人支援上海工人。1933年，20岁的唐弢开始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说，“从我自己的经历，从我读过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书，特别是从执笔时的环境和情绪测量起来”，“有自己对社会的议论和评价。这就注定我与创作无缘，只配写些不入于‘艺术之宫’的‘鸡零狗碎’的杂文”。是文学青年主动的社会承担意识使唐弢喜欢上了用杂文作为投枪匕首的战斗形式：有感想，有意见；要抗争，要呐喊；要战斗，想回击。其杂文尖锐凌厉、用笔狠猛，极具鲁迅之风。也正因风格近似于鲁迅，其创作被统治当局当成鲁迅的作品加以围剿，同时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

认识接触了鲁迅，唐弢得到直接向鲁迅请教和学习的机会，并在鲁迅的直接关怀、影响以及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的支特、帮助之下，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其杂文创作几乎可以达到与鲁迅杂文乱真的程度。他在《长短书·序》中自述：“提到杂文，终不免想起鲁迅先生，因为他是这一文体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唐弢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追求再合适不过了。1987年我采访唐弢先生时，唐弢已经74岁高龄，早已“功成名就”，是全国瞩目的著名学者。可他人老心不老，仍在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忙于完成他的毕生夙愿——鲁迅传记的写作。

当时，陆续出版的鲁迅传记已有10部之多。唐弢要写的这部按顺序排列应是第11部，可他跟我说：“我不想写第11部！”他决心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要写出鲁迅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风貌，而且要通过鲁迅这个人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面貌写出来。他说，法国作家巴比塞写《斯大林传》时，副题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唐先生很喜欢这个副题，这也成为他写鲁迅传记的一个追求。当然这并非易事，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做到的。

唐弢也有不少有利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活动，亲自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当时，唐弢还是一名上海邮局的拣信生，年龄不到20岁。从1932年（19岁）开始，他正式接受地下党的领导和教育，同邮局里的年轻职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阅读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鲁迅的小说、杂文等进步书籍。同时，他还与邮局的一些进步青年一起，背着国民党特务的眼目，秘密地为党员朋友和文艺界进步人士传递信件，有空时也练习写文章投给报刊。1933年，共产党发表共同抗日宣言，工人运动随着转向爱国救亡运动，他就写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散文寄给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还给马彦祥编的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寄稿。

唐弢开始写散文，后来，因为他喜欢读鲁迅著作，尤其喜欢鲁迅的杂文，就逐渐写起杂文来。他的杂文颇有鲁迅杂文的风骨，以至国民党文人把他文章当成了鲁迅写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用过一个笔名：唐俟。1934年1月6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先生请客，唐弢是被请客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0岁。在这次宴会上，令唐弢高兴的是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鲁迅，还见到了郁达夫、林语堂、胡风、阿英、曹聚仁、陈子展、徐懋庸等文学名家。席间，鲁迅跟他们开玩笑说：“唐先生写文章让我替你挨骂！”说完，大家都笑了。鲁迅劝他做个业余文学家，认为这样生活比较有保障。鲁迅的话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有机会同鲁迅先生见面、通信，尤其是经过了上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运动，使唐弢更加认识到鲁迅先生的伟大，鲁迅那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更加增强了他对鲁迅的敬仰。这正是唐弢构思、酝酿写鲁迅传记的思想基础。

唐弢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既是创作家，又是研究学者。从他1933年6月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第一篇（因为以前的已无从考查）文章《故乡的雨》算起，他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出版的专著比较重要的就有20多种，其中散文集有《落帆集》《莫斯科抒情及其他》《生命册上》

唐弢：见证中国现代文学

□李 良

书话。《周报》被禁后，唐弢又改编《文汇报》副刊《笔会》，然而1947年5月《文汇报》也被迫停刊。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唐弢为推动民主进步的文化事业和迎接人民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8万字的《唐弢杂文集》（由《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劳薪集》《识小录》《短长书》和《集外》合编而成），收入作者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几乎全部杂文作品。在思想文化战线急风骤雨中成长起来的唐弢，浓郁的感情与锋利的思想锋芒凝就50年杂文成就。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唐弢在自觉传承鲁迅杂文的新文学传统而实现鲁迅式杂文风格的追随者形象之余，还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一个作者的最大的敌人，正是他自己铸成的模型，他必须时时努力，从已定的模型里跳出来。为了解脱这灵魂的羁绊，我至今还在挣扎。”唐弢自觉地与时代同步，丰富、完善和发展自己的风格。“杂文之所以异于一般的短评，就因为前者是文艺的——加以缩小，也可以说是诗的和散文的缘故。”充分发挥艺术的创造力，不矫饰，不卖弄，稳健厚重，胸有千峰万壑，真可谓洋洋洒洒、深邃博大。唐弢最终具备成熟风范，巍巍然大家气象。

《晦庵书话》：现代书话的集成

书话是极具文化渊源的，可以上溯至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就是作为一种现代文体，也愈来愈被文学界接受。无论从内容材料、行文风格，还是从体式选择及文化气氛等方面来看，书话都成为现代以来独具特质的文学书写。但是，具体涉及这一文体的倡扬、实践乃至贡献之大，影响之广者，非唐弢莫属。1961年3月30日，唐弢使用笔名“晦庵”于《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书话”专栏，勤耕不辍。1962年6月北京出版社撷选印成《书话》初版，第二年5月《书话》印行第二版。两年间两版累计印数5万册，在读者中备受欢迎，好评如潮。其内容之多而广，其见识和文笔实乃一般人难以企及，确乎为书话一体撑起了一个标杆，很难超越的标杆。

其实，唐弢写作书话的时间始于1945年春。《万象》杂志上的系列行文以及《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下）”的22篇文章组成的“新文艺”的脚印——关于几位先行者的书话，是唐弢书话的早期代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其自觉的书话文体意识。“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也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繁杂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书话〉序》）这是唐弢第一次以“书话”二字而不附加其他限制词去命名自己的书，他为书话文体开路拓荒，功不可没。1979年，他又把自己从1945年开始30余年间写作的这一体裁的作

品，精选汇编成《晦庵书话》。近200篇文章极丰富地保留了唐弢对我国现代50多名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和对20多名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评论，以及一些书刊出版的史实资料，一时风靡海内外。可以说迄今为止，只要谈及书话，决然离不开唐弢。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同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把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唐弢赋予书话以写作者的个性生命，使书话跻身一种文学文体成为可能。旧时读书人谈书，多言版本目录，耽于藏之乐而少形诸文。唐弢的书“话”不是书评，也不是读后感，而是在知识、掌故、品味的讲述中存藏书家的雅趣、史者的深邃、学人的智慧、艺术家的审美，立现书人之大境界。从封面装帧到版式设计，从藏书印到藏书票，从编辑到印行，头头是道，时有新见。唐弢书话可以作为史话来读，史实、史德、史识统一，启人深思。书话的境界实际上也是作者人格境界与审美境界的投射，导杂归纯，知识性与趣味性水乳交融，唐弢以丰富而敏锐的感情感悟、把握、开掘，透射出感人的真性情。言简，典雅，意深，清风徐来，境界叠出：品书会心、考镜源流、书坛掌故、序跋甘苦、装帧学问、书城纵横（杨义《唐弢书话境界》），几乎篇篇臻于化境。

《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学科的厚重之作

1959年，唐弢从上海调北京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指导助手和研究生之余，他将精力从创作转到文学研究上，其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鲁迅研究、文学史编写、史料收藏等方面。

鲁迅生前最后3年，唐弢身受垂教；鲁迅逝世之后，唐弢参与第一套《鲁迅全集》的校对出版。其后，他竭力搜集鲁迅佚文遗著，独力完成《鲁迅全集补遗》及《续编》等，这些为以后重编《鲁迅全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般来说，研究者对于自己崇拜的对象往往缘于主观情感介入而失去相对理性，唐弢则不然。唐弢的人生梦想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展开的，但是在鲁迅研究中，他能够平心静气地走近鲁迅世界，这一点在那个“要以鲁迅的精神研究鲁迅”的时代里，尤为科学而可贵。默默无闻地读书写作，或考证，或比较，或与鲁迅“对话”，努力“读懂鲁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而不保守，以开放的现实主义精神面对鲁迅，完成一生中走得最长、用力最苦的精神跋涉。唐弢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写一本真正的鲁迅传，但天不假年，他一病不起，现存的11章《鲁迅传》残稿成为其学术生涯的绝笔，实为遗憾。

亲。平时，他自己要做研究，还要指导前来求教的年轻人的创作与论文，研究所和研究室的活动要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也要参加（唐弢曾连续几届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年轻的学者出书希望他写序，年老的学者（多是他的朋友）出书也希望他写序或写书评，对此，唐弢不好拒绝，却有些应接不暇。唐弢是一个干什么事都非常认真的人，不论写序或写书评，他必定要通读原稿才肯下笔。遇到文学历史方面的问题，还得去查阅当年的书籍和杂志。唐弢的书多，但因住房狭窄，很多书只能装箱、打捆，摞起来存放或放到床下，因此想要找到一本需要的书或参考资料，不出一身汗是办不到的。有时为找一本书，半天的时间就全泡汤了。所以，唐弢几次说，他年纪大了，做起事来很慢。有时，刚坐下来想构思自己的作品，一个电话，一次来访，就搅乱了思路。一次，我对唐弢说，您想写鲁迅传记，这是个大工程，需要安静的环境，对外面的事情或别人求办的事就推掉一些吧。唐弢看着我苦笑，没有回答。

唐弢对自己很严格，对年轻人却非常热情。我来文学所后，唐弢对我很关心。但是，看到唐弢忙碌的情况，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尽量不去打扰唐弢。有一个时期，我和唐弢住在一个小区。有时看到办公室里唐弢的信件多了就顺便给他带回去。一天，我去唐弢家把信件带给他。唐弢坐下来，问我今后打算选择什么研究方向。我说，现在研究室里研究小说、诗歌、散文的同志比较多，我想研究戏剧。唐弢说，“那好。现代研究室还没有人研究戏剧，你既然对戏剧感兴趣，作为研究方向是可以的。”我请教他从哪方面入手。唐弢说：“你先不要急于写文章，先从阅读‘五四’以来的原始资料入手。先了解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和戏剧发展的脉络，多读作家的作品，多记笔记，把基础打扎实。此外，还要多看戏，研究戏剧不能只读剧本，还要懂得舞台演出，即使是研究现代戏剧也要关注当代戏剧的发展，不要等别人写成了戏剧史再去读剧本。”唐弢的话对我的启发很大。

我按唐弢的话去做了一边阅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杂志如《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一边阅读小说作家和剧作家的作品选集，有感想就随时记下来。虽然花费了几年的工夫，但对我的研究工作却帮助很大。可以说我后来能够在现代戏剧研究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与那几年的阅读和资料储备是分不开的。

1992年，我读到《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和第6期连载发表唐弢撰写的《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第一至四章，心里非常高兴。然而，因为身体的原因，唐弢的写作终于没能继续下去。这真是鲁迅研究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弥补的损失。

唐弢的治学精神

□刘 平

等；杂文集有《推背集》《海天集》《投影集》《短长书》《劳薪集》《识小录》《繁弦集》《春涛集》等，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弢杂文选》；理论集有《文章修养》《向鲁迅学习》《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燕雀集》《海山论集》《鲁迅的美学思想》《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情》等；诗歌散文集《劳歌行》等。鲁迅逝世后，唐弢亲自搜集资料，与朋友一起参加《鲁迅全集》初版的编校工作。解放后，由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后者已译成日文。但他却不以此为满足。每当说起自己的治学经验，他总是说：“我成名早，底子差，我没有读过正规大学，基础知识缺乏，靠自学求知，基本功不足。我觉得自学一点儿一般知识不难，钻一行也不难，但要做到博而且专，那就难了。我的办法是下苦功边做边学。如果别人写一篇文章用两天时间，我就用四天时间。认真地查资料，认真地写。”唐弢正是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刻苦精神弥补了自己的不足，成为一位自学成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直到老年，唐弢仍然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治学作风，从不满足自己的水平，而是抓住一切时机吸收新的知识，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

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掀起文学观念和方法论的讨论，唐弢十分关心。他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要有所突破，有所提高，这就要学习和吸收一些新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老专家也不例外，不然就跟不上时代了。因此，唐弢多年来总是一边做研究工作，一边密切、敏锐地关注着文艺界的动态。即使是有生病住院，他也要家人把报纸、杂志带给他，一有时间就认真阅览，以获取新的文学信息。尤其可贵的是，唐弢不论接受什么新知识、新方法、新观念，从不生搬硬套，更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消化，拿出自己的看法来，即使遭到一些头脑发热的提倡者的反对，他还是要坚持，并做耐心的解释说明工作。比如关于“寻根文学”。当时创作界出现了一股寻根热，理论界和评论界也一起跟着张扬。唐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寻根”是移民文学特有的现象，比如有一个黑人作家写了一部作品《根》，他从非洲移民到美国的，他要寻根，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就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根就在你的脚下，你还要寻什么根呢？

关于方法论问题，唐弢认为，在文学研究中，方法论很重

不注重方法论的研究，这是不对的。对于一篇作品或研究论文来说，内容好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少相应的方法，还是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从这一点说，唐弢认为当年把“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是可以的，但一定要介绍得准确、运用得恰当，不能生搬硬套。他认为，有些人在介绍新方法时，存在着一些片面性，他们把方法论只理解为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重要的，但光有这点还不够，艺术方法论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方法，一是表现方法。文艺比别的意识形态更重视形式，形式要讲究表现，在戏剧中就是表演，形式应当丰富多彩，表现方法也应多种多样。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意识流等等，戏剧的表演体系还有斯尼尼尔斯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等的区别，他们互相借鉴、相互补充，丰富了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使内容得到更好的体现。可以说，形式与内容是同等重要的。舞蹈靠动作，绘画靠色彩，文学靠语言，每一种艺术如果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表现形式，它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唐弢说，把思维方法同表现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发展，把方法论只说成思维方法，写出来的文章像哲学论文，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评论文章也应该给人以艺术上的审美感受。有人把阿Q的行为用哲学方法去解释，这样来，阿Q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还有人把结构主义套在阿Q头上，用这种死的、抽象的方法去分析人物的做法是不合适的。这是唐弢宝贵的经验之谈，也是唐弢对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深切体会。唐弢的理论文章就写得非常活泼，艺术性很强，使人读起来不感到枯燥乏味，如他写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深入浅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趣味。唐弢说：“有人评论我的杂文，认为散文气息较浓。这也许同我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另外，我也有我个人的追求，就是杂文不要写得干巴巴，要写得艺术性强一些。我想，写文艺评论也应该这样。世界上许多有名的文艺评论家本身就是文体家，写评论文章既强调科学性，又注意艺术性。我认为，既然是文艺论文，就应该写得有点儿艺术性。在理论

上给人以理智的启发，也在感情上给人以美的享受。”

唐弢不仅做学问认真，为人也非常谦和可

本专刊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协办